

科學、生物政治與社會網脈： 近代中國優生學與比較研究取徑之反省

期五第誌雜方東	
時評	可以稍警矣。
	威海衛英公署之停工
時評	又談訂招募華工之約
	賤種辱國
時評	足必欲又獻於美洲抑以中國婦人之醜足為世界之特別品而必欲藉此以博萬國之頭等賞牌耶噫是誠何心
	日本致勝之由
時評	日軍戰勝俄國以來歐洲各報莫不交口稱頌惟倫敦泰晤士報論日本之致勝歸功于國民其言最中要害爰揭二
	五月

《東方雜誌》於一九〇四年刊登了一篇名為〈賤種辱國〉的社論

鐘月岑

國立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助理教授

古今論衡 第 22 期 2011.06

一、前言：優生學的出現，向左走？向右走？

優生學是科學知識的一個分支，一八八三年英國學者法蘭西斯葛登（Sir Francis Galton）將看似客觀的生物統計學，以及應用遺傳學原則來辨明人群中較為不被社會接納的份子、並加以改善人種的科學技術命名為「優生學」，此項新知在二次大戰以前於歐洲、美洲與東亞等地廣泛流行。然而，納粹德國與日本在二戰中實行的種族淨化政策使得優生學惡名昭彰，其在戰後也多少由於同樣的原因而消失。在近數十年間，隨著基因改造與複製技術（cloning 或譯克隆）等研究領域的開展，優生學改頭換面在世界各地捲土重來，與國家推動政策提昇人口健康，以及個人重視後代健康聯袂出現。

我們如何瞭解因時代脈絡、社會條件和政治意識形態不同而有的錯位、甚至相反印象的議題？為什麼我們需要對這樣的議題進行分析？為何我們需要增加我們對「優生學」的認識，尤其是這麼一個被納粹德國用來開脫其有系統性滅絕猶太種族運動、因而背負污名的過去的學科？我的一位日本朋友（他是位人類學者）拒絕參加我所舉辦的東亞優生學歷史的工作坊；優生學似乎提醒了他日本那段法西斯獨裁的過去，而處理這樣的題目將有損他身為一個左翼思想家的社會良心。然而，優生學絕不只是單純的右翼現象，從歷史上看來，甚至對我那位日本朋友的立場帶點反諷意味的情形是：日本的馬克思主義生物學者正是一股內部的批判力量，其遺產使得我們現在對優生學的史學研究與批判成為可能。

在一八八三年，達爾文的表弟法蘭西斯葛登創造了「優生學」（eugenics）一詞，指稱那些應用基因法則來促進人類發展的科學或技術。隨後在十九、二十世紀之交於西方興起的優生學運動不僅呼應了更大框架下的文明論述（Civilization discourse），也援引達爾文對社會變遷與社會控制的關注，從而出現兩條不同的優生學取徑：一為消極減少不良份子的數量，一為積極鼓勵優良份子的繁衍（reproduction）。由此，特別是在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優生學大受歡迎，廣泛流行於世界各國。在蘇聯，俄國的遺傳學者在優生學運動中相當活躍，直到李森科（Trofim Lysenko）在一九四〇年代譴責優生學意識形態不正確（ideologically unsound），並將超過三千名的生物學家驅離工作崗位，關閉數家頂尖的遺傳學實驗室。在共產主義中國，優生學的捲土重來與自一九八〇年代以來的一胎化政策，都是要扭轉毛澤東之前為了增加工業生產的勞力供給而實施的災難性的人口擴張政策。由於優生學是在中國的城市環境中發展，它關心的既非種族淨化，也非提昇純淨血統。一般的中國百姓並不知道優生學跟納粹大屠殺的連結。與此相反，正如「優生優育」的口號所意味的，優生學在中國的城市人口論述中強調的是改善教育與養育（nurture）。如果在網際網路上以「優生優育」為關鍵字搜尋，將會出現近兩百萬筆條目；其中「優生優育」多半被寬鬆的定義

為一對夫婦透過醫療照護、營養補給（nutrition）與教育，而能夠健康地生育、撫養其獨生子女的方法。

我們對優生學、乃至遺傳學的負面觀感，主要根源於戰後由於其與法西斯主義的連結而給予的污名印記。隨著優生學歷史的發展，它所涉及的意義範圍涵蓋了從大屠殺、基因治療、幹細胞研究與人類複製，到好萊塢意圖創造出完美身體的尖端整容手術等廣泛的層面。在中國的語境中，優生學指涉了從傳統媒妁之言的婚姻安排、傳統中國醫學知識中的育兒與房中術，到強制/自願墮胎，以及強制性節育（compulsory sterilization）。須牢記在心的是這個主題在一定範圍的歷史脈絡下通常相互矛盾，且俱辯證地不同（dialectically different）的多重意義。

近年來，科學知識界歷來的兩大陣營：社會建構論者與「客觀性」信仰論者之間掀起了一場高度政治化的「科學戰爭」（science war）。^① 為了避免讀者認為這篇關於優生學的論文有助長、繼續炒作這場論爭的嫌疑，我想強調筆者單純的意圖僅是將法蘭西斯葛登提倡的生物計量學的多重軌跡詳盡地記載下來；此外，本文也描述了這些思想隨後在分歧的全球脈絡下，特別是西方社會中的傳播，優生學在中國的在地化之歷史經驗展示出科學實際上是文化活動的一種。

本文章節的安排首先討論十九世紀後期以來全球優生學的運動的知識生產，在文明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論述語境裡，優生學對支配者與被支配者的吸引力；接著，筆者討論掙扎於國際強權勢力中身為被支配者的沒落的中華帝國，敗戰賠款的恥辱和中國民族性的心智和身體缺陷連結在一起，在眾聲知恥自強改革的民氣集結成社會網脈氛圍中，社會整體（extended social body）是改革的對象亦是改革的推動者，此為中國優生學輸入的知識生產背景；筆者繼而聚焦地討論中國知識份子欲進化於文明世界的關懷渴望中，所提出不同的優生的方案；為了能夠破解單方面塑造肯定或否定的優生學意涵，筆者延伸至比較方法論的討論，希望幫助讀者拋開以往優生學制式僵硬的印象，因為單方面否定或肯定的印象只會使我們或避開這個被汙名化的課題，或忽視它挾帶其他不同科技名義，重現於不同歷史脈絡。

①「科學戰爭」源自一九九六年數學物理學家 Alan Sokal 投了一篇標題 “Transgressing the Boundaries: Toward a Transformative Hermeneutics of Quantum Gravity” 的文章到美國紐約 *Social Text* 期刊上，在當時未經評審的情況下出版，事後 Sokal 在其他期刊裡揭發自己的文章實是捏造之作，其主要目的是來調侃 *Social Text* 期刊大力宣傳的後現代主義，並主張左派的社會科學應以「科學理性」為本，這個爭端名為 Sokal Affair，它開啓了科學史、科學研究、科學哲學、科學社會學界裡兩派「社會建構論」和「客觀理性論」的爭辯。論辯的過程中漸漸衍生出第三觀點的「科學實在論」來綜合前兩者的歧異。對於這個過程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參考 Stephen Turner, “The Third Science War: Review Essa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3.4 (2003): 581-611. Turner 認為 Sokal 和其他老左派的科學家和哲學家會站在同一陣線撻伐後現代主義、科學研究和文化研究者，是因為後者在知識上和情緒上反科學。我之所以提起這個議題，主要是因為優生學歷來很具爭議，由於它廣泛涉及許多社會現象，在它開始發展的階段無法明確定義其學科的範圍，很容易被認定是偽科學，並且在科學界發生過李森科等人以政治意識形態掛帥鎮壓優生學遺傳學的活動，反反覆覆，可以說是「科學戰爭」前的「科學戰爭」，只不過是前者沒有死過人，後者在西方則死傷無數！

二、退化的焦慮：全球優生學的知識生產背景

本文將科學視為文化，而非普遍理性，此一特殊觀點是基於下列事實：在歐洲脈絡下，優生學的知識生產，與工業化、民族國家形成、新興統計學科的出現、生物學的新發展以及中產階級興起等等現象中的既得利益密不可分。這些既得利益為傅柯所謂的生物政治（biopolitics）提供了舞臺，「其目的在於把整個社會體或群體當成一個整體來看待，或統計測量或干預，以便施加種種統合性手段予以控制。」^②

根據法蘭西斯葛登的自傳 *Memories of My Life* (1909)，他受過幾次偶發性的傷，但並未提及自己在年輕時因感染性病導致的不孕；他傾向提到他的祖先，而非同輩及更年輕的一代。筆者懷疑這個私人面相是促使他對「退化」問題產生理論興趣的因素之一；他認為天才的父母很難生下資賦優異的後代。在達爾文的 *The Variation of Animals and Plants Under Domestication* 於一八六八年問世後，葛登在自己的家族中發現這樣的「退化」：儘管達爾文與其父（Erasmus Darwin）兩人在科學上的成就非凡，其他家族成員（包括葛登自己）卻未擁有如此傑出的表現。葛登本人深受這種上層階級素質的退化與回歸平庸（regression and reversion to mediocrity）的現象所困擾，於是以統計方法為本，欲藉此證實他對心智遺傳（mental heredity）的看法，並進而建立一套在社會上推行政治與宗教改革的基礎。^③ 在英國，葛登所察覺到的生理與心智退化現象在某程度上被當成是工業化與都市化的後果，兩者共同造成且維持上層階級與下層階級間的顯著差距。葛登援引自己對英國農村與工業區域的統計分析，向當時的中產階級的城市居民提出警告：在兩個世紀後，其後代數量將只佔全國人口的五分之一。三十年後，當英國在二十世紀之交的波耳戰爭（1899-1902）面臨徵兵困難時，生理退化與生育率下降的隱憂再度爆發，成為亟待解決的當務之急。^④

美國步上相同的工業化道路，在世紀之交的幾年內也經歷了劇烈的社會變遷。城市與貧民窟的擴張，加上來自農村與國外的大量移民，使得賣淫、犯罪、酗酒與心智

② 這段有關傅柯「生物政治」的引文轉引自 Ian Hacking。Hacking 認為國家（state）觀念源於義大利，但卻是十八世紀的德國思想家和政治家全面意識到民族國家（nation-state）的統計學特徵，並要求設立統計局以定義自身及其權力。對於結婚年齡、生育率、死亡率、勞動力供給、土地面積的統計不僅構成對國家而言至關重要的人口管理的基礎，也與軍事及資本主義發展密切相關。見 Ian Hacking,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16-26; Donald Mackenzie, "Statistical Theory and Social Interests: A Case-Stud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8.1(1978): 35-83. Mackenzie 也論證葛登對優生學的提倡，符合了想要力爭上流的中產階級專業人士對抗上層階級的利益，見他的作品：*Statistics in Britain 1865-1930: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81).

③ Ruth S. Schwartz Cowan, *Sir Francis Galton and the Study of Hered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1985) and Raymond E. Fancher, "Scientific Cous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les Darwin and Francis Galton," *American Psychology* 64. 2 (2009): 84-92.

④ 見 Richard A. Soloway, *Demography and Degeneration: Eugenics and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90), pp. 38-47.

缺陷（mental defectiveness）的比例大幅攀升。當白人新教徒與優生學者深恐民族退化（national deterioration）而亟需宣洩自身對社會與經濟的焦慮時，他們總是將矛頭指向黑人、愛爾蘭與義大利的羅馬天主教徒，以及波蘭、俄國與德國猶太人等被視為遺傳上次等的種族。正如 Daniel J. Kelves 所指出，比起英國，美國優生學運動對黑人、猶太人與天主教徒移民展現出的種族主義偏見更為突出：

英國社會大體是由同質的族群組成……在最近數十年中也未遭遇非白人的大量移民……當英國的優生學家提到愛爾蘭與歐陸移民帶來的威脅時，他們苦惱的往往是差別生育率對國民素質（national fiber）的威脅，從而削弱帝國與德法兩國競爭的能力。英國優生學乃以自身對階級甚於種族的莫大敵意為標誌。^⑤

工業化與都市化在英美兩國造成的問題同樣盛行於法國。然而，與英美兩國形成對比的是，法國面臨的情勢更為嚴峻，亦即人口減少的衝擊。一八七〇～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戰爭後，法國喪失了其在歐陸的軍事優勢地位；與此同時，德國人口的總數與增長速度都勝過法國。由於大規模的徵兵愈形困難，歐洲的軍事競賽更加劇法國原本就因人口減少引發的深沉焦慮。^⑥

德國的優生學則偏好使用「種族衛生」（Rassenhygiene）作為強化種族血統、增加社會生產力，與建立文化優越性的手段。然而，在希特勒於一九三三年掌權前，恢復並改良北歐血統並非德國優生學的主要目標，彼時「種族衛生」關切階級甚於種族，與上述提到的國家相比，德國種族衛生的旨意跟其他西方優生學運動並無根本不同。^⑦德國因工業化而惡化的社會與政治問題包括以下三個面相：（一）新興基進的勞工運動威脅到德國中上層階級；（二）各式犯罪活動的增加破壞國家正常的功能；（三）賣淫、自殺與酗酒，以及精神失常與弱智人數的增長，為新德意志帝國帶來沈重的財政負擔。^⑧

無獨有偶地，左派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聯在一九二〇年也曾由官方發起一場優生學運動；在一九三〇年代，俄國的人口遺傳學與農業遺傳學居世界領導地位。其優生學運動以階級議題為中心，這是因為俄國遺傳學家具有自身明確的政治目標（political agenda），他們反對革命與內戰，因為這些都對優生有不良退化的影響（dysgenic），

⑤ Daniel J. Kelves,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Genetics and the Uses of Human Heredit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1985), p. 76.

⑥ William H. Schneider, "The Eugenics Movement in France," in Mark B. Adams ed.,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70-71.

⑦ Sheila F. Weiss,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1904-1945," in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p. 10.

⑧ Sheila F. Weiss,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1904-1945," p. 12.

從而造成社會動盪、引發了貴族與知識份子階層出走的移民潮。一九三一年以後，隨著李森科得勢並發動一系列迫害蘇聯遺傳學家的恐怖活動，蘇聯才成為全球第一個明令禁止優生學的國家。^⑨

其他優生學風行的國家處處可見，根據一份一九二四年刊登在《優生學新聞》(Eugenical News)上，有關《優生學國際委員會》(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of Eugenics)的報導，其正式優生會員有阿根廷、比利時、古巴、捷克斯洛伐克、丹麥、法國、德國、英國、義大利、荷蘭、挪威、俄國、瑞典、瑞士和美國等 15 個國家，此外還有包括巴西、加拿大、哥倫比亞、墨西哥、委內瑞拉、澳洲和紐西蘭等 7 個準會員國。^⑩儘管各國的立場有些許差異，全球對優生學的興趣是建立在葛登所提倡的人種改良的思想與對文明退化的焦慮基礎上。如同葛登在自傳《我的一生》(Memories of My Life, 1909)中寫道：

在達爾文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的定律之下，人類本性的發展還沒有趕上宗教文明的進步。人類在昨日還是野蠻的，因此不能期待其人種的天賦已能與近日的進步相契合。我的理論已由下面的事實證實：古老文明國度的成員比起那些新近脫離未開化狀態的人，遠遠未能意識到自己的本性無法滿足道德上的需求。一個黑人的良知會為自己本性中的野性衝動驚駭不已，且容易被傳教士激發；但自滿自重老神在在(steady-going)的中國佬是幾乎不可能被激越的。^⑪

葛登的焦慮投射到全體人類，似乎黑人尚有希望被改造，而具有古老文明薰陶的中國人老神在在，顯現不出任何焦慮，反倒是沒希望被改進的。這是因為達爾文的天擇說理論最初承諾了文明(Civilization)對野蠻的勝利，然而這個過程有模稜兩可之處：在文明化的道德中，被涵化者(the acculturated)起初對劣勢份子仍懷有同情，後來卻轉而強調社會干預／競擇等強制的制度性手段來避免因過度文明化而導致種族退化的趨勢。與此相應，在達爾文的演化觀中，自然最初是推動文明的力量，後來則為文明取代。^⑫自然和文明形成一組相互作用的動態力量(dynamic pair)，意味著某些人

^⑨ Loren R. Graham, "Science and Values: the Eugenics Movement in Germany and Russia in the 192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2.5 (1977): 1133-1164. Mark B. Adams, "Eugenics in Russia, 1900-1940," in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pp. 153-216. Diane B. Paul, "Eugenics and the Left," in *The Politics of Heredity—Essays on Eugenics, Biomedicine, and the Nature-Nurture Debate* (Albany: SUNY Press, 1998), pp. 11-35.

^⑩ Mark B. Adams,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p. 5. 新近出版的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History of Eugenic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0), eds. by Alison Bashford and Philippa Levine, 顯示優生學在一九二〇年代以來在全球流行的盛況，橫跨歐亞非澳大陸。

^⑪ Sir Francis Galton, *Memories of My Life* (New York: Dutton, 1909), p. 317.

^⑫ 見 Charles Darwin,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p. 168-169. Mike Hawkins,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Nature as Model and Nature as Threa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本書也探討了鑲嵌在社會達爾文主義裡自然的矛盾力量與優生學的良知。這個根深蒂固的矛盾並非源於內在邏輯，而是受不同的歷史脈絡的

群、民族、種族與階級比較他者文明優越，從而正當化其對次等族群的統治。¹³「黑人」與「中國佬」分別被當成是未開化與衰頹之古文明的代表，而同時被歸入次等族群這一類範疇。

因此，作為自強之道的優生學在兩方面起了作用：對被支配者而言，優生學使之能達到優勢文明的標準；對支配者而言，則利用優生學抑制種族退化的趨勢，並確保其優越地位。隨後在二十世紀之交興起的優生學運動不僅呼應了更廣泛的文明論述實踐，同時也表達了達爾文對社會變遷與社會控制的關切。後者使得優生學出現兩種取徑：一為消極減少不良因子的數量，一為積極鼓勵優秀因子的繁衍。西方優生學運動的導源於以工業化引起的社會政治問題及其對人口的不良影響為目標的社會行動。與此相反，許多深受西方帝國主義威脅的非西方國家則尚在尋求富強的漫漫長路上。社會達爾文主義似乎是非西方的改革者信仰的動力，這讓他們相信將優生學引進自己國家，以之為邁向文明世界之鑰，是他們責無旁貸的一項國族義務。尤其是這些非西方的知識份子在西方求學或尋求技術轉移的訓練之際，遭遇到無端的歧視（無論是個人親身經驗或媒體對其民族性格的描寫），愈發堅信實施這套優生學政策之必要，這種國際生物政治的兩面性益發彰顯出來。

三、優勝劣敗與生存的掙扎：中國優生學的知識生產與社會網脈

自鴉片戰爭（1840）到甲午戰爭（1894-1895），中國在國際軍事競賽中遭遇一連串挫折，國家主權不僅被遠在一方的帝國主義勢力蠶食，連文化上的近鄰日本也加入瓜分的行列，雪上加霜更深深印刻了民族的恥辱感。中國被迫賠償大量賠款，開放通商口岸與礦業、鐵路、水陸等的利權，甚至將臺灣割讓給向來在中國天朝體制內被當做朝貢國的日本。這一連串事件充斥於《國耻事典》的條目中。¹⁴曾經被葛登描繪成「自滿自重自持的中國佬」的形象已然崩潰，中國經歷了從受創傷殘、驚嚇慌亂到跌跌

理解與政治用語左右。目前仍廣被接受的觀點把自然當做現代性的對立命題，而現代化則是征服自然的過程。Julia A. Thomas 在 *Reconfiguring Modernity: Concepts of Nature in Japanese Political Ideology* (2001) 中駁斥這樣的觀點，並探索自然在近代日本政治中不斷變化且經常對立的面相。

¹³ Prasenjit Duara, "The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 and Pan-Asianis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2.1 (2001): 99-130.

¹⁴ 見莊建平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編，《國耻事典》（成都：成都出版社，1992）。類似的歷史寫作模式仍然相當流行。例如，我曾買到一本由張海鵬等人編輯，標題為《國耻百談》（北京：中華書局，2001）的書。柯保安（Paul A. Cohen）也曾討論過中國近代歷史寫作中「毋忘國耻」的書寫類型，並追溯其在民國及早年中國共產黨統治時期的前身，見氏著，"Remembering and Forgetting National Humiliatio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n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2003), pp. 148-184. 柯保安的近著持續底探討晚清到一九八〇年代將近一世紀的中國人的「毋忘國耻」，見氏著，*Speaking to History: The Story of King Goujian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撞撞自我轉化（self-transformation）等一系列的變遷。「挫敗與國族衰弱」一類的措辭牢牢嵌入集體危機意識及文學敘事手法中，甚至連著名作家曾樸都自號「東亞病夫」，並以此為筆名出版《孽海花》（1903-1930）。¹⁵ 這本小說從同治中期到光緒後期以來三十年間一連串喪權辱國的事件為背景，特別是一八九九～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之亂，以及一九〇〇年八月八國聯軍攻入北京，洗劫全城。這種自我嘲諷性的承認失敗並嚴厲批判自身民族性退化的文學手法成為一種流行策略，如同槓桿作用一般，把徹底被踐踏的自我作為躍向自我翻轉與上昇的動力。¹⁶

這樣的敘事策略滲透到各式各樣的文化論述場域內，特別是改革者的措辭中。他們努力宣傳其社會政治的改革方案，企圖將這個國家引導至共同的目標，也就是抵除負面自我（negative self）以邁向自強。康有為在一八九八年維新運動給光緒皇帝的奏摺中寫道：

觀萬國之勢，能變則全，不變則亡，全變則強，小變仍亡。（皇上與諸臣誠審知其病之根源，則救病之方，即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篤守舊法而不知變，處列國競爭之世，而行一統垂裳之法。¹⁷

承認挫敗衰落，是標誌著自我更新（self-renewal）的開始，這一特色也出現在改革派學會的名稱與宣言上。例如：上海強學會在一八九五年十一月聲明，缺乏知識進步與教育政治改革乃是中國衰弱的原因，而學會的目標便是要促進中國自強，以作為學會創立之大綱。身為學會的發起者之一，康有為在為慶祝學會成立而作的序文中進一步闡明這些原則：

¹⁵ 根據 Rebecca E. Karl 在一九九七年九月針對一則發佈在 H-Asia 上的留言所做的回覆，《時務報》在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五日轉載一篇《字林西報》上的文章；文中稱「天下四病人」乃土耳其、波斯、中國與摩洛哥。同樣的說法也出現在梁啟超為一本關於一八七七年的俄土戰爭的著作所寫的〈前言〉中，後以〈俄土戰紀敘〉之名單獨刊登在第 51 期的《時務報》上。梁啟超在文中稱：「昔之泱泱雄國，囊括東西羅馬之舊土，跨亞歐非三洲之沃壤者，今且蕭然不絕如縷矣。猶復不思自振，禍亂將至，則補苴彌縫，以期苟安，及事之既平，又復晏然為燕雀之計，處堂以嬉矣。是以外侮間歲輒起，每起必喪師割地，日朘月削，而不復能國其國也。比者革雷得阿比西尼亞之事，西方論者，以為若在十年前，則土其必亡矣；今者歐洲諸雄，方并心注力于中國，無暇以餘力及區區之土，而土遂獲全焉。嗚呼！與土同病者，其危可知矣，而況于倚強盜以作腹心，引餓虎以同寢食，而尚欲以苟延旦夕、為小朝廷者乎。嗚呼！吾願取湯君覺頓筆譯俄土之事，懸諸國門，以為我四萬萬人告也。」《飲冰室文集》（臺北：中華書局，1983），第一冊之三，頁 33-34。同樣在一八九八年，康有為在《突厥消弱記》這本最終在百日維新運動中進呈給皇帝的著作裡寫下西方人視中國為「東方的突厥」。其他在上海的西文報紙雜誌也經常使用這組慣用語來指稱中國，其中西方的傳教期刊《萬國公報》則是一個主要來源。隨著時間流轉，土耳其有時會從這慣用語中消失，而獨留中國成為「東亞病夫」。這個意象很可能受到日本影響而得到強化，雖然它的系譜經由西方／土耳其的連結更顯清楚。

¹⁶ Jing Tsu (石靜遠) 的著作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深刻地分析從「失敗、苦難與屈辱」(failure, suffering and abjection) 的建國與重建敘事中產生的主體能動性，並且成功地駁斥批評家在分析第三世界文學中浮現的主體性時所使用的「剩餘主體性」(residual subjectivities)、「顛覆意識」(subversive consciousness)、「邊緣性」(marginality) 等概念。

¹⁷ 康有為，〈上清帝第六書（應詔統籌全局摺）〉，收入蕭伯贊等編，中國史學會主編，《戊戌變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卷二，頁 197-198。

彼馬基頓之破波斯，回教突厥之破羅馬，及近者泰西之分非洲，擄掠凌暴，異種殊族，皆以愚弱被吞食者。……吾中國地合歐洲，民眾倍之，可謂龐大魁巨矣，而吞割於日本，蓋散而不群，愚而不學之過也。……美人學會繁盛，立國百年，而著書立說多於希臘羅馬三千年，故兵僅二萬，而萬國莫敢誰何，則強莫與京。¹⁸

其他跟康有為及其弟子梁啟超有關的改革派學會則採用了諸如「知恥」、「保國」、「群萌學」、「蒙學」、「新學」、「群學」等名稱。¹⁹ 儘管各自親滿與排滿的政治立場將改革者與革命者區分開來，承認失敗的修辭策略與保國保「黃種」的目標則同為孫逸仙、鄒容、章炳麟等革命者在呼籲採取政治行動時所共享。²⁰

在文字作品中坦承失敗與恥辱最終成為一股巨大力量，傳達出集體的生存焦慮並激起對「社會連帶」（group solidarity）的熱切想望。這股力量植基於社會達爾文主義的邏輯內，亦即將群體選擇當成民族生存的演化類型。最早拿這套演化理論來理解當下與未來政治的學者是留學英國歸來的嚴復（1854-1921）。嚴復在一八九五年翻譯赫胥黎（T. H. Huxley）的《天演論》（*Evolution and Ethics*）時強調國家與權力的集體性質（collective nature），認為個人主義的價值僅止於解放個人力量以為群體效力。²¹ 梁啟超繼承嚴復對「社會連帶」的強調，從而呼籲建立一套新知識——群學。他在〈論學會〉（1906）一文中闡述他的論點：

獨故塞，塞故愚，愚故弱；群故通，通故智，智故強……數人群而成家，千百人群而成族，億萬人群而成國……群形質為下，群心智為上……國群曰議院，商群曰公司，士群曰學會。而議院、公司，其識論業藝，罔不由學；故學會者，又二者之母也。學校振之于上，學會成之于下，歐洲之人，以心智雄于天下，自百年以來也。²²

¹⁸ 康有為，〈強學會敘〉，收入姜義華、吳根樑編校，《康有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卷二，頁194-197。

¹⁹ 據郭正昭估計，梁啟超參與的全國性學會超過30個；他經常撰寫短文宣告這些學會的成立。見郭正昭，〈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晚清學會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1972）：557-625。

²⁰ 郭正昭，〈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晚清學會運動〉，見郭文中有一小標題「受挫折的群體情緒與種族存亡的自覺」。革命者的受挫情緒和種族危機感更加強烈，甚而轉為仇滿反滿情緒，章炳麟進而斥責保皇改革者為不「知恥」，見汪榮祖（Young-tsu Wong）新著，“Zhang Binglin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in *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47-69.

²¹ 據史華慈（Benjamin Schwartz）的見解，嚴復強調之國家與權力的集體性質與個人浮士德式的能力（Faustian capacities）仍是普遍存在於中國知識份子意識中最根本的特質，儘管他被標為社會主義者、自由主義者，甚至是新傳統主義者。見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2). 關於嚴復思想與史華慈之分析更細緻的討論，中文讀者可參考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和批判〉（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0）。

²² 這篇論文是梁啟超所寫長文〈變法通議〉的一部分，見吳松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2001），第1冊，頁38-40。

梁認為歷史上中國士人曾依循儒家的傳統結黨集社，但在清代卻未繼承這項傳統。這是由於紀昀（即紀曉嵐，1724-1805）將明朝滅亡歸咎於朝廷政治中紛亂的黨爭，多數的士紳與學者為保住政治事業，都避免參加集會。如此阻撓終使有才華與積極的學者放棄他們的努力。在歐洲，每一門學科都會組織自己的協會或學會以聚集人才、增進知識。要復興中國，梁啟超建議在全國設立學會以爭取人才；向富有者募款，並邀請外國僑民加入成為會員，如此才能使每一門學科知識都專業化。他相信經過十年的實踐努力，中國必定能夠擺脫加之於自身的恥辱。²³

這股新的學會風潮與先前傳教士創辦的協會不同，後者如益智書會（1834）、馬禮遜教育會（1836-1849）、醫學會（1838）、促進女性教育會（1844-1899）、上海文理學會（1858）、中華基督教青年會（1885）、博醫學會（1886）、廣學會（1887）、中國協會（1899）、中國教育會（1890）、中國基督教女青年會（1890）等，主要目的都是為了宣教佈道。²⁴在晚清成立的六百多個協會、學會中，強學會與康、梁為促進延伸之社會整體（extended social body）的群體連帶而鼓吹的新「學會」觀在在統攝了傳統的黨、社、會等概念。這個徵召人力資源的新辦法也力圖織造出一條新的社會網脈（social nexus），使得傳統基於鄉里地緣、行會、宗教信仰與親屬關係的私人利益網絡，與以公共利益為目標的專業結集相互重疊。這樣的公共群體接受來自國家與各界人士的贊助，而回報以跟社會、經濟、文化、外交等領域相關的先進學科知識，使中國能夠有效地與國際對手競爭，進而洗刷目前為止因積弱不振而蒙受的污名。

藉由科學與技術當做群體知識以復興民族的決心與旨趣乃是吸引海內外的中國人創辦學會時的組織原則。在民國初年出現的四百個學會當中，一九一四年由留美學生於紐約州綺色佳（Ithaca），仿效倫敦皇家學會成立的中國科學社，標誌著第一個橫向開展的學術研究紐帶。這群海外留學生從他們在美國的生活經驗獲致對種族深刻的敏感性（profound racial sensibility）：身為知識菁英，他們卻被歸類在「華工豬仔」這個深受歧視的類型。²⁵這個共有的日常經驗加深他們自強救國的信念，並幫助他們形塑

²³ 梁啟超，〈論學會〉，《飲冰室文集點校》第1冊，頁38-40。

²⁴ 郭正昭，〈中國科學社與中國近代科學化運動（1914-1935）：民國學會個案探討之一〉，收入《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1971），卷一，頁233-281。

²⁵ Weili Ye,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另外的資料也可佐證，楊絳的父親楊蔭杭（1878-1945）在《老圃遺文集》曾回憶伍廷芳（1842-1922）的遭遇，伍曾獲得英國倫敦學院法學博士並為英國和香港執業律師，楊記載：「吾友廣東某君，英國律師也，在途與西人爭論，西人掌其頰，破其眼鏡。某君欲起訴，西人猶不信；後商之本國律師，律師謂起訴不利，西人恍然大悟，乃向某君免冠謝曰：『吾以子為苦力也，今而知子乃劍橋人也（Cambridge Man）；吾以為苦力可毆也，今而知苦力不可毆也。願奉三百金賠償損害，請免訴。』某君受其金，撥充善舉。」。見氏著《老圃遺文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1993），頁741。楊蔭杭定期為《申報》撰寫專欄〈時評〉，此篇題為〈苦力〉的時評出現於《申報》一九二三年五月七日。這種種族的偏見和歧視的遭遇至今仍然是留學生的深切體驗，我清華的同事數年前留學英國牛津時，也曾經被噓唏：“Chinaman! Go Home!”



圖一：此圖為後藤新平所畫，其題字為「唯是自然，乃能成體」，「呂氏春秋曰：流水不腐，戶樞不蠹 明治三十三年秋 棲霞題」。為楊儒賓收藏。後藤以殖民者之姿，鼓吹臺灣女人放足，行動自如，身體方能強健。此圖亦為傅大为引用在《亞細亞的新身體：性別、醫療、與近代台灣》（臺北：群學出版社，2005）。日本殖民者雖未強制臺灣女人放足，但看在華人男人眼中是汗顏無地的。

一個超越先前以省份、族群、語言、故鄉、同袍（cohort）、友誼、親屬身分等連結彼此的國族連帶（national solidarity）。中國科學社在一九一八年遷回中國，總部起初設在南京，後移往上海，並持續發行《科學》月刊。不久在北京、廣州、瀋陽、蘇州、杭州、青島等地紛紛成立支會。中國科學社與政府資助創辦的中央研究院、教育基金會、大專院校與私立的研究機構，成為培育第一代本土中國科學家的搖籃。

然而，除了心理與智力上公認的缺陷（recognized weakness）外，中國還須洗刷被譏為「殘廢之軀」（bodily disability）的民族恥辱。在論述民族性時，中國與外國的評論者同時對準的攻擊對象之一便是女人的纏足（圖一）。²⁶中國婦女腳下包覆著三寸金蓮，於隱蔽的室內空間踩著蹣跚步伐行走，纏足曾是漢人暗中抵抗滿清政權的族群印記，也是美感、教養（civility）、以及中國上流社會的文化象徵。²⁷然而自從以客家人為首的太平天國之亂（1850-1864）開始，纏足便成為社會批評的目標，

²⁶ 其他目標包括：鴉片成癮、民間習俗以及虛弱體質，促使著眼於根除這些問題的改良協會成立。

²⁷ Dorothy Ko (高彥頤), "The Body as Attire: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Footbind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8.4 (1997): 8-27. 同時參考她的著作：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2005), Chaps. 1-2.

被視為限制女人為社會貢獻生產力的生理屏障（physical barrier）。不久後，纏足成為醫療化的對象，在西方醫學與傳教士的眼中，成為病態的表徵：特意將雙足扭曲成不自然的形狀，不僅損害由上帝與父母賜與的軀體，更使得這些殘疾的女人無法上教堂，因而無法獲得靈魂的救贖。這股宗教信念激起傳教士——特別是西方女性傳教人員，推行反纏足運動的熱情，並吸引了中國改革者的目光。²⁸一八七五年，天足會在廈門成立，並在一八九五年的立憲運動期間擴展到上海。同年，鄭觀應（1842-1922）指出中國女人的纏足與男人去勢讓中國成為西洋人口中的笑柄，而呼籲對纏足行為予以懲罰。站在衛生、體質衰弱與種族退化的立場上，康有為與梁啟超在一八九七年發起全國性的反纏足會，並說服其成員在幫他們的兒子物色媳婦時，只挑選那些擁有天足的女孩。²⁹當中國女人跨越國境旅行時，纏足的形象從過去的國粹（national essence），成了恥辱的標籤。著名的《東方雜誌》在一九〇四年刊登了一篇名為〈賤種辱國〉的社論（圖二），用來指稱在美國聖路易斯萬國博覽會上兩名纏足的中國女侍；而前來參觀的美籍華僑則要求禁止這個有失顏面的展覽。這位《東方雜誌》的編輯還提到他在日本萬國博覽會的臺灣展示館上看到數個纏足的中國女侍的經驗，他憤而批評中國人彷彿在日本遭受的羞辱還不夠似的，竟然得跑到美國來才能滿足胃口。³⁰為了一舉洗刷身體生理與心理的污名，中國不僅得求生存，更要尋求有效的改良之道。

四、社會達爾文主義與中國優生學者的關懷

社會達爾文主義在十九世紀末風行於不同地區後，產生各種分歧混雜的改編版本（adaptations）。³¹在東亞的脈絡下，「混種」（hybridization）的社會達爾文主義乃是對支配過程的策略性翻轉（strategic reversal）。正如 Robert Young 闡明的，「混種」涉及被支配者「創意地回應」（creatively echoing）支配者的權威，如此不僅削弱外來殖民權威的形式，也使得在地被支配者能夠積極地抵抗。³²對於曾是中國與韓國之追隨與效法的日本人來說，社會達爾文主義足以取代傳統宇宙道德秩序中的理學觀。此外，

²⁸ Hsiuyun Wang (王秀雲), *Stranger Bodies: Women, Gender, and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 1870s-1930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2003), Chapter 5, "The Disembodied Foot that Travels: Western Medicine and Footbinding."

²⁹ 坂元ひろ子，〈足のデイスコース—纏足、天足、国恥〉，《思想》907（2000）：145-161。

³⁰ 這則報導與一篇美國排華籍苦力的報導並置，收入《東方雜誌》1.5（1904）：19。

³¹ Richard Hofstadter 探討了美國的保守派如何擁抱社會達爾文主義來為他們向其他的人種、族群、階級主張其自由放任經濟政策、帝國主義擴張以及社會道德的正當性。作為有力且無所不包的論述實踐，社會達爾文主義成為支配語言，甚至連它的反對者，如美國的社會主義者與進步的神職人員都用同樣的演化措辭來爭取社會改革與福利計畫。見 Richard Hofstadter,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1944).

³² Robert Young, *White Mythology* (London: Routledge, 1990), pp. 148-149.

可以稍警矣。

威海衛英公署之停工

英人自租威海衛後，使署早已建造，而華民政務司署尚未興築，暫以舊屋辦公。甲辰春，卜地海邊，鳩工建設。此處市房百餘間，每間給官價銀二十圓，勒令拆讓。近忽有停止工程之說。此與劉公島之停造水師病院同一事理。豈果俟日人攻陷旅順，而以威海交還我國乎。

又談訂招募華工之約

特蘭斯哇招募華工事，英國特派員至津，與北洋大臣商議。袁督深不謂然。電告外務部請止張德彝畫押未成。不知此係特別苛例，訂明招募華人至彼五年後，全將華工送還國華工至彼，絕無利益，不過輸送無罪之人到彼受牛馬之管耳。蓋政府以爲美州既禁華工，非澳均限制華人，得此爲尾閥之洩，亦謂停之衡而不知此舉虧損國體，貽累同種，爲至可歎悼也。

賤種辱國

舊金山報云：差拿輪船抵埠，有上海茶店陳新禮者，帶來纏足少女二名，往聖路易賽會。常侍茶之役。旅美華人聞此消息，即上書正監督倫貝子，副監督黃開甲，請其查明嚴止，免辱國體。夫纏足爲中國最野蠻之陋習，方奉明詔勸誡革除，何物賤種，乃敢於萬邦矚目之會場，獻此醜態，可謂無恥極矣。記者於去夏曾游日本，赴博覽會，見臺灣館中有一茶室，以中國纏足少婦數人侍茶，見之覺毛髮悚然，汗顏無地。今歲于美國賽會，又聞斯舉，我國人豈以獻醜於日本之不足，必欲又獻醜於美洲，抑以中國婦人之醜，足爲世界之特別品，而必欲藉此以博萬國之頭等賞牌耶。噫，是誠何心。

時評

十九

甲辰

時評

二十

五月

圖二：〈賤種辱國〉的社論，《東方雜誌》1.5（1904）：19-20。

它也提供一套新的理論配備（theoretical apparatus）來理解國際事務裡權利（right）與力量（might）之間的落差，也就是說，國際法與相關的西方知識乃是自強的處方，而「生存競爭」（the struggle for survival）更是國家與國家，而非個人與個人間的競賽。非西方的社會達爾文信仰者，主觀式地換轉個人之間競爭的殘酷無情；換言之，個人與個人的競爭很殘酷，但集體化地看生存競爭，則國與國的競爭之殘酷對個人而言，比較不會那麼刻骨而是強調群體連帶（group solidarity）——通常以獨立國家地位（Statehood）的形式——作爲進化過程的基礎。例如福澤諭吉在他早期作品《文明論之概略》（1875）中，根據「有機體國家」（organic State）理論改造他的「啓蒙」邏

輯，使之合於「最適者生存」的概念。加藤弘之（1836-1916）則在他一八八二年出版的《人權新說》中鼓吹社會達爾文主義，提出自然權利乃是演化過程的產物。他試著說服自然權利論的熱情支持者能夠暫緩他們的激進主義，避免保守派與自由派兩派在國內政界互相鬥爭，這兩派各自挪用史賓塞：「進化理論的雙元性，分別為國家主權主義說（Statism）和人民權利說」做辯護。³³

在中國，與嚴復的詮釋類似的有梁啟超，梁啟超在《新民說》中強調「群」為競爭的基本單位，宣稱「自由云者，團體之自由，非個人之自由也……使濫用其自由，而侵他人之自由焉，而侵團體之自由焉。則其群固已不克自立，而將為他群之奴隸」。³⁴韓國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受到在美求學經驗，以及加藤弘之、福澤諭吉、嚴復、梁啟超等人的譯介（mediation）與詮釋的影響，傾向強調國家的優越性與國家（而非其臣民）的權利。在日俄戰爭期間（1904-1905），以「亞洲人對抗白種人支配」為口號尋求「亞洲連帶」（Asian solidarity）的行動中，社會達爾文主義「結群」（grouping）的修辭成為決定性的論述力量；這個修辭闡明泛亞洲主義者的論述軌跡，亦即以明治政權為首，號召中國和韓國與日本進行合作。³⁵

正如社會達爾文主義被視為理解並達到文明化過程的機制，東亞優生學的提倡者在宣揚他們的想法時，基本上認為這套知識是進步、科學且利他主義的。雖然韓國幾乎沒有優生學的提倡者，也因此沒有發展任何明顯的優生學運動，他們卻認為自己比中國人勤勉，且比日本人更富活力。韓國人「固有的優越感」引導知識份子徐載弼（1866-1951）在一八九〇年代著名的《獨立報》的社論中論道：只要韓國人擁有適當

³³ 這種雙元性使得史賓塞思想在日本有不同應用的可能性。他的有機體社會（organismic society）與社會演化（social evolution）理論受到日本保守派的歡迎；他們亟欲使爭取自由與人民權利的運動能夠掌控在政府之手。而自由派人士在參與這些運動時也吸納他關於自由競爭與代議制政府的想法。見 Michio Nagai（永井道雄），“Herbert Spencer in Early Meiji Japan,”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1 (1954): 55-64. 在右派與左派的挪用中，加藤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表現出超越同時代的進步性；他聲稱「由於其未來取向（future orientation）而較真正的保守主義不保守；由於其擁抱論爭（contestation）而較真正的專制主義不專制；由於其歡迎競爭的偶發性（contingency of competition）而較真正的寡頭主義不寡頭。」見 Julia A. Thomas, “Social Darwinism’s Progressive Posture in Early Meiji Japan,” the 2002 AAS presentation and unpublished paper. 更深入的分析，可見她的著作：Julia A. Thomas, *Reconfiguring Modernity: Concepts of Nature in Japanese Political Ideology* (Berkeley: UC Press, 2001), chapter IV.

³⁴ 梁啟超，《新民說》（北京：中華書局，1959），頁45。這段文字原始出處是刊載在《新民叢報》7（1902.4.1; 1902.4.15）。

³⁵ 除了強調人類自主的主觀意志來翻轉「最適者生存」的殘酷事實外，韓國的知識份子如俞吉濬（1856-1914）、尹致昊（1865-1946）、李光洙（1892-1950）與韓龍雲（1879-1944）等人基於自身的儒家、基督教與佛教等等宗教信仰，都把「競爭法則」（the law of competition）看成是物質的現實與現實自身短暫而有限的世俗面相。然而這些人物之中，特別是李光洙，最終都無法抗拒底認為日本的軍事侵略行動對於東亞的最適者的表現，也因此對等於道德上可接受之舉。見 Vladimir Tikhonov, “The Experience of Importing and Translating a Semantic System: ‘Civilization,’ ‘West’ and ‘Russia’ in the English and Korean Edi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Han’guk Minjok Undongsa Yŏn’gu* 32 (2002): 57-103, 與 Hŏ Donghyŏn 未發表之論文 “Forms of Acceptance of Social Darwinism by the Korean Progressives of 1880-1890s.”

的西方科技轉移和指導，並供以妥善的污水處理系統，韓國將能成為東方的種族中最優秀的一支，³⁶一八九八年，徐載弼組織發起韓國獨立運動，之後被政府解散而逃往美國。數十年後，由於日本優生學的意識形態有著科學背書，加上中國在抗日戰爭中節節敗退及隨後露出的撤退腐敗之勢，兩者因素結合，大大增加了日本帝國即將擴張到整個東亞地區的可能性，使得韓國的知識份子諸如李光洙等人開始將其重心由原來的民族獨立與民族性的改良，轉向支持日本優生學所強調的純正血統（pure blood）與作為邁向混血同化墊腳石的皇民化運動。³⁷

福澤諭吉於一八九六年出版由先前發表在報紙上的文章結集成書的《福翁百話》，其中提出了「人種改良」說。在他看來，這場由西方發起、試圖將動物交配繁殖技術應用到人類身上的運動，跟讓一架飛機從地球飛到火星是一樣荒誕無稽。儘管如此，這個新思考對富國強兵、帝國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文明化進程不啻是極大的啟發。就種族改良而言，福澤認為藉優生學可以製造出德行典型如佛陀、孔子及耶穌，聰穎超人如牛頓，或如加藤清正（1562-1611）受人尊敬的後代，遠遠較忽必烈（1215-1294）征服中國殺人如麻更有道理。據傳忽必烈原本打算徹底滅絕被視為次等族類的南方漢人，而代之以更加優秀的北方民族。但經過中書令大臣耶律楚材（1189-1243）的規勸，忽必烈最終放棄了這個想法。與此相反，在福澤諭吉眼中，現代優生學能就膚色、美貌、智力、活力，甚至是頭部與手臂的大小等期望的特質進行篩選培植的技術，比起殺嬰或消滅全部人口的駭人慘黯前景更具吸引力，也更為可行。因此，優生學值得投入更多的才識智力，使其能增進文明進步。

欲晉陞中國於文明世界的渴望對梁啟超而言更為急迫。梁在中國知識界的份量可與福澤在日本的影響力並駕齊驅，而他也經常被譽為「中國的福澤諭吉」。中國除了缺乏民族意識與無法加入世界條約體系中的民族國家之列外，梁啟超批判的矛頭還指向「野蠻」的早婚習俗，認為這項劣俗要為中國的種族退化以及中國在競爭的演化過程中失去支配地位，從而無法達到全面文明化負責，梁啟超相信禁絕早婚與落實家庭改革是停止劣生循環（dysgenic cycle）的必要手段。³⁸當早婚成為劃分文明與野蠻的界線時，日本與中國幾乎處在同個水平上，皆遠遠落後於西方國家，僅比印度的情形稍微

³⁶ Vladimir Tikhonov, "The Experience of Importing and Translating a Semantic System: 'Civilization,' 'West' and 'Russia' in the English and Korean Edi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pp. 57-103.

³⁷ 李潤楨，《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帝國主義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の優生思想》（東京：東京學芸大學碩士論文，2002）。皇民化運動促成一系列涵化被殖民的臺灣人與韓國人的教育與文化運動，以使他們能以日本皇民的身分被徵募。

³⁸ 梁啟超，〈禁早婚議〉與〈新民議〉合篇，收在《飲冰室合集·文集》（上海：中華書局，1932），卷三，頁104-114。

好一點。³⁹考慮到日本已致力於模仿歐美改革其政治制度，在文明程度上卻仍處於落後位置，梁啟超敦促他的愛國同胞不要輕忽早婚這個議題；他將早婚描繪成邪惡的集體習俗，使民族生存陷於險境。梁的導師康有為早先已就人種選擇（human selection）提出兩點計策：一為產前照護與女子教育，一為結紮禁育（sterilization）。此外，康有為也鼓吹種族間的通婚，希望藉著此舉漂白中國人的膚色與血統。⁴⁰

梁啟超的學生潘光旦（1899-1967）就優生學這一主題發表大量文章而被視為具代表性的優生學家。由於他在一九一三年的一次運動傷害後因缺乏適當的醫療照護而失去一條腿，之後又於一九二二年留學美國，刻骨銘心地經歷了種族階序（racial hierarchy）與身體殘疾（disability）的雙重敏感的文化體驗而成爲他研究優生學的動力（圖三）。他在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取得動物學與遺傳學的學士學位，之後在哥倫比亞大學跟隨 Charles Davenport 攻讀碩士，他也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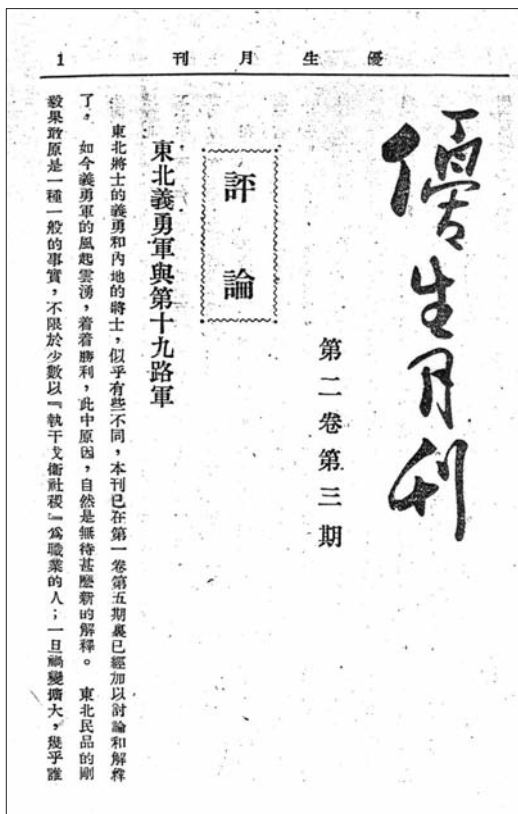


圖三：潘光旦像（1899-1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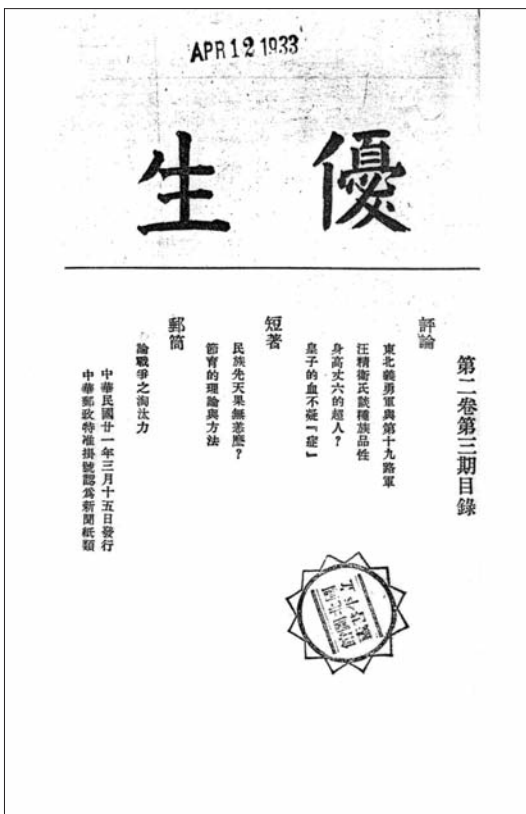
紐約長島上的優生學檔案局（Eugenics Record Office）以及 Davenport 設在冷泉港的實驗基地實習過幾個暑假。他在一九二四年成立優生學會，但是參與的會員很少，不久就不了了之。一九二六年他回到中國推行他的優生學理念和社會運動。根據我幾年前訪談潘光旦的女兒潘乃穆的說法，潘光旦在留美期間成爲基督徒，並且獲得 YMCA 基督教青年協會的資助成立學會，這項支持維繫到他在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設立的《優生》（《優生月刊》）（圖四、五），隨著期刊的夭折，他也就與基督教漸行漸遠。之後於一九三二年四月，他隨即又創設另外一個優生期刊名曰《華年》，是「促華族達成年」的簡稱（圖六）。據潘乃穆回憶，這些期刊的稿件和出版基本上是靠著潘光旦的獨立作業和師友同事學生的支持，素有名望的社會學家陳達、吳澤霖和費孝通即是。另外，潘也是當時雜誌期刊如《學燈》、《時事新報》、《觀察》、《科學》的編輯或撰稿者，這也是《潘光旦文集》約有六百萬字之多的原因。

³⁹ 優生學論述的討論不能僅止於追溯優生學名詞的變遷而已，必需結合強種富國的討論與各地的時空脈絡來看，在這裡我們看到印度的例子是聚焦在生育控制、社會與家庭改革的討論。見 Sarah Hodges, *Contraception, Colonialism and Commerce: Birth Control in South India, 1920-1940* (Farnham, UK: Ashgate, 2008).

⁴⁰ 見康有為在《大同書》（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94）的〈去級界平民族〉（頁126-136）裡提到離婚漂白約需三百年、〈去種界同人類〉（頁137-146）提到斷嗣方法和〈去家界爲天民〉（頁227）裡並議設人本院爲胎教之院。



圖五：《優生》2.3 (1932.3.15)：1。
(感謝潘乃穆提供資料)



圖四：《優生》2.3 (1932.3.15)，目錄。(潘乃穆提供)

潘是中國科學社的一員，也同樣面臨學科建置的問題，醫學學科和生物學科有著美國洛克斐勒基金會（Rockefeller Foundation）和中基會（China Foundation）的贊助得以展開，隨著留學生的回流能夠跟國際接軌，並進而思考本土科學的特色，例如動植物學中中國本土品種的分類命名和進一步研究，甚或中醫醫藥單方複方的科學化，都可以很快地取得國際學術的肯定。⁴¹在沒有奧援的情況下，潘光旦呼應丁文江（1887-1938）在民國九年提倡全面整理家譜的計畫，以便進一步統計研究中國人民族性的體質特徵（phenotypic characteristics）與聯姻的模式，將傳統的記載轉化成現代的生物資料庫。⁴²潘光旦在媒體報章上為優生學釐清可能的誤解，他說：「優生學並非自由戀愛，非性教育，非公衆衛生，非試驗婚姻，非禁娼運動，非胎教，非體育研究，非國家強制的婚姻，並不主張屠戮頑弱，並不欲繁殖超人，並不欲生產天才以供

⁴¹ Yuehsen J. Chung, *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Eugenics in Sino-Japanese Contexts, 1896-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第三章有關學科建置的部分。

⁴² 丁文江，〈哲嗣學與譜牒〉，《丁文江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8），卷一，頁3-23。此文原刊登在《改造》3.3（1920.12.15）、3.4（1921.1.15）、3.5（1921.2.15）。



圖六：《華年》3.2（1934.1.13）。（潘乃穆提供）

社會不時之需，並不欲取消戀愛中浪漫的部份，並不主張用繁育禽獸之法育人，並不違反自來關於性道德，婚姻，戀愛，家庭，及生男育女之一切合情合理的觀念。」⁴³ 潘光旦在第一時間內並沒有提出他所謂的優生學為何物，這種反制式定義除了反映當時優生學傳入中國的各種挪用式的瞭解，也反映了潘光旦企欲建構中國優生學的資源不足之嚴峻的學術現況。為了克服這個結構和研究環境的困難，潘光旦就地取材轉化傳統的家譜材料，據此他摹仿了法蘭西斯葛登的著作《遺傳的天才》（*Hereditary Genius*）中研究演員的譜系而寫作了《中國伶人血緣之研究》（1934）和《明清兩代

⁴³ 潘光旦，《優生概論》（收入《潘光旦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第1冊），頁250-265。

嘉興的望族》(1937)，在方法論上，潘光旦比葛登更上一層樓，關懷的層面不止是顯性體質 (phenotypes)，而且是隱性的遺傳體質 (genotypes)，因此不但需要從直系的家譜著手，還得要收集旁系宗族的記載和傳記的文類等等的史料來建構論述。

為了引起大眾對優生學的關注，潘光旦與周建人、張競生和孫本文就「性道德」、「智力測驗與階級歧視」的議題在報章雜誌上公開辯論。這些辯論除了廣泛激發讀者的興趣，也是反映這些意見領袖們對優生學在地化的理解和思想耕耘，例如 Margaret Sanger 在一九二二年訪華所展示的節育方法而引發的「性道德」的議題上，張競生提出交媾制與情人制的性遊戲來調和性幻想需要與一夫一妻的性道德，張並提出夫妻同時性高潮會孕育堅強優秀的受精卵，進而生產健康聰明的下一代；周建人認為張競生將優生等同為女性陰道收縮的快感和分泌液，是來自道家房中術的封建遺毒，不足效法；潘光旦則引用葛登和 Davenport 的統計數據來強調聰明才智的家族遺傳的因素，並且以 August Forel 的研究為據，認為性冷感的婦女也可以生育聰明健康嬰孩，進而駁斥張競生的主張為荒誕不羈的言論。⁴⁴ 當這些男性的社會批判者就女性的「性自由」、「性快感」大肆發揮之際，面對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國民黨的清黨及鏟除共產黨員的風聲鶴唳的政治背景，也許他們是意有所指，也許他們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地藉機批判白色恐怖下被剝奪的政治自由。

一九二〇年代末期在「優生學與階級歧視」的議題上辯論，潘光旦就地取材，認為傳統的門當戶對的媒妁之言、科舉考試、傳宗接代的孝道和宗族制度等等的文化選擇機制使得中國人在世界古老文明之中立於不敗，沒有被歷史洪流淘汰，不失為可行的優生機制；周建人則批評此種傳統機制是以宗族家族的利益為考量，不見得符合國家的利益，因此周提倡「自由戀愛」，摹仿自然界的求偶交配的本能；孫本文一方面批評周建人是生物決定論者，一方面則批評潘光旦不僅錯將科舉考試當作智力測驗，而且無法廣泛施行於中國眾多不識字的人口；潘光旦則否認優生學以財富和權力來論斷中國人的素質，尤其面對中國人根深蒂固的貧窮問題。

潘光旦一方面就地取材，就傳統文化轉化成現代優生的機制；一方面積極參與社會運動來實踐其優生理念。由於潘光旦對 Sanger 在中國推行節育運動持保留態度，深怕淪為中產階級滿足自私性慾的工具，而不顧自己對社會國家的生產天職，長期而論，中產階級的少子化將會造成整個階級的萎縮，潘因而建議在農村推行節育。⁴⁵ 於是在一九三〇年代初期加入晏陽初、陳達等人倡導的「鄉村建設運動」，以及與婦女

⁴⁴ Yuehsen J. Chung, "Better Sex and Better Conception? Eugenics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 Contemporary China" 收在《科技、醫療與社會》(預計 2011.12)。

⁴⁵ 潘光旦，〈生育限制與優生學〉，收入《潘光旦文集》第 1 冊，頁 349-359。

節育、產婆新式接生教育和助產士訓練的先行者楊崇瑞博士合作，希望能夠解決歷來中國農村婦女生育過多，婦女因產褥熱和破傷風死亡與新生兒高死亡率的現象。根據楊崇瑞一九三四年的報告，由於節育所需要的物質條件如沖洗液的昂貴和避孕藥需要冷藏設備不存在於農村，使得中國節育運動只在城市風行。⁴⁶

一九三五年潘光旦加入由陳立夫所主導的「以中國文化為本位的文化建設」一系列公開討論，潘光旦贊成文化建設來建構文化主體，但是不贊成「中國本位」，因為會有「漢人中心」的意涵，他寧願本位涵俱文化的自立、自愛和自重。潘光旦的文化折衷立場使他比較贊同以嚴格的科學方法來檢驗傳統所承襲應用的世系選擇的機制，包括：皇室與社會政治菁英份子的宗族聯姻策略、殺害女嬰及其他控制死亡率的方法，跟男嬰的照護。⁴⁷根據他的想法，傳統的胎教、科舉考試、宗族聯姻與生育控制等習俗都應取決於公開辯論與個人深思熟慮的考量。面對日本在一九三〇年代開始對中國的鯨吞蠶食，在此國家困難時刻，國民黨右派勢力急欲透過「新生活運動」來箍緊社會控制和文化活動，潘光旦此時呼籲重建文化主體，並提出了與其他國家的優生運動不同的解決方案，例如降低生育婦女與新生兒的死亡率、防止吸毒／性病／妓女與高自殺率、改革荒政、提高經濟生產力、公平分配財富、控制都市化、提高家庭教育與倫理價值，以及開放言論、媒體與政治集會自由作為改良中華民族的一套優生學的建議，這些方案的內涵可以說是潘光旦從一九二〇年代初期引介優生學在地化的集大成。潘光旦的優生方案，不僅與當時歐美和日本的優生運動強制執行弱智者或社會不良分子的禁婚絕育政策的歷史經驗非常不同，在今日高度資本主義化的中國社會，儘管中國當局仍然堅持自己走的是社會主義路線，潘光旦當時提出的對策對許多攸關中國人民福祉的問題來說，似乎仍不失其時效，不曉得我們應該是感念他的高瞻遠矚，還是應該感慨中國人的邯鄲學步。

蘆溝橋事件（1937）開啓八年長期抗日戰爭的序幕，中國面臨歷史性的人口大遷徙潮流，維持人口的數量和素質是決定著中華民族活力的兩大關鍵。日本政府在國家總動員的號召下，近衛內閣設立了厚生省來規劃人口政策以儲備兵力進行太平洋戰役，在此時代需要下，日本在一九四〇年通過了「國民優生法」，一方面禁絕弱智者拙劣者的婚育，一方面以糧餉配給和教育特權的待遇來利誘鼓勵政府眼中的社會優良分子的生育，日本政府也積極地在殖民地臺灣和朝鮮推行皇民化運動來擴展兵源。由於國民政府一路撤退到四川大後方，兵員折損和老百姓的傷亡是有目共睹的大問題，

⁴⁶ 嚴仁英編，《楊崇瑞博士——誕辰百年紀念》（北京：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1990），頁125-136。

⁴⁷ 李中清、王豐，〈兩種不同的結制性限制機制：皇族人口對婚內生育率的控制〉，收入李中清、郭松義編，《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4），頁39-58。

潘光旦一九四二年受國府之邀，與其西南聯大社會系的同仁們如陳達、李景漢、吳澤霖等展開人口社會調查工作，進一步擬定「民族保育政策綱領」（見文末「附錄」）。同時，爲了有別於日本的種族意識形態，潘光旦將中文與日文漢字相通的「優生」和「民族衛生」改爲「民族健康」。相對於日本強調「大和民族」的純化政策，綱領中的「中華民族」是落實潘光旦稍早提出的「非漢人中心」的理念，此綱領並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通過國民黨的六中全會成爲國家政策。

「民族保育政策綱領」除了典型的優生法案有著限制劣等人口（包括有惡性遺傳疾病者、痴瘋低能者、身體嚴重畸形者、身體經醫師診斷特別羸弱者）生殖的規定外，也禁止溺嬰、墮胎、早婚、娶妾的傳統陋習和綁架販賣人口，並且強制婚前健康性病檢查，更重要的是針對非漢人爲中心的民族通婚生育（non-Sinocentric miscegenation）的人口政策來進行漢人與其他少數民族之文化融合。

不同於納粹德國鼓吹日耳曼亞利安民族或法西斯日本倡導的大和民族的純種之偉大，潘光旦批判希特勒迫害猶太人的種族清洗政策和日本的侵略中國，並認爲每一個種族或國家都有其優秀與劣等的人口成份，沒有哪一個種族或國家低劣於他族他國。潘光旦以「文」「質」來評斷漢人文化的進展現狀是「文勝於質」，而蒙、回、藏、苗、僛的文化是「質勝於文」，兩者融合才能「文質彬彬」，培育下一代優良的中華民族。⁴⁸

隨著國府撤退到臺灣之後，這項政策並沒有機會付諸實行而胎死腹中。之後一九五〇年代到二〇〇〇年的中國優生學發展，我最近在另外兩篇文章裡有詳細的討論，在此不容贅述。⁴⁹

五、生物力量的雙面刃與優生學比較研究的方法論

根據以上的研究和之前對中國優生學歷史投下十餘年的心力，在此，筆者要對中國優生學的歷史經驗做一點方法論的延伸討論。優生學何以能有如此之份量，能爲最具侵略與高壓的干預控制的國家機器提供意識形態的辯護？正如傅柯所指出的，從現代性中誕生的生物力量（biopower）使得生存之必要（imperative to live）與生對死的

⁴⁸ 潘光旦，〈抗戰建國與民族〉（寫於1943年），收入《潘光旦文集》第9冊，頁569-573。以及潘的另外一篇文章〈抗戰與民族〉，收入《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95），頁106-110。

⁴⁹ 我另外兩篇文章：“Better Sex and Better Conception? Eugenics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 Contemporary China”收在《科技、醫療與社會》（預計2011.12）和“The Postwar Return of Eugenics and the Dialectics of Scientific Practice in China” in *The Middle Ground Journal: an Online Journal for World Historians* (forthcoming) 則涵蓋一九五〇年代以後到二〇〇〇年的中國優生學發展。

支配成為個人身體規訓的一環，並且擴大這些規訓在經濟、科學、政治層面上的重要性，這些規訓宣稱能夠提高人類生存的機率與品質，「假若種族滅絕（genocide）不是古老的殺人力量在今天的借屍還魂，而的確是現代權力的夢想的話，這是因為權力存在於並且運作於生命、人類、種族和大規模的人口現象的層次上。」⁵⁰然而，即便是生物力量之最惡劣形式的種族歧視，所彰顯的也不單純是對舐血割喉之殺戮，它同時也包含了對生命之渴望：努力創造、管理並美化生命，使其變得更好，以此促進人類的未來幸福。⁵¹絕大多數的支持者在宣傳優生思想時，並不認為這些主張是邪惡、偽科學，或有害的思想。我們該如何看待生物力量的雙面刃以及它同時在不同國家追求其獨特的現代化道路時所造成的非同步影響？

筆者之前出版的著作（見註⁵²）是透過東亞脈絡下的比較視野來解決這些問題，並將重心放在中國與日本兩國的優生運動的不同進展。⁵²我這裡的比較研究（comparativism）與德國最近的歷史修正主義不同，後者乃是將猶太人大屠殺（Holocaust）的獨特性「歷史化」（historicize），並拒絕為大屠殺擔負集體責任而興起的研究取向，並且著眼於鞏固歷史的連續性，並為德國的國家認同（national identity）樹立一個正面的過去。⁵³如果將修正主義定義成根基於新材料或新詮釋而建立的新興學術研究，則幾乎可適用於學界領域內所有學術上的努力與新成果。我所採用比較取徑並非企圖把優生學的特殊性給相對化，從而低估其對人類生命的有害影響。

就前書研究成果具體而言，日本優生學強調單一種族的同質性（racial homogeneity），中國優生學則強調多族群融合（ethnic mingling），因此，對兩國進行比較研究時，一方面審慎分析各別的發展過程，另一方面則突出牽涉兩方發展合流分流中的議題的複雜性，這樣的視角可避免強化一九四五年以前優生學在東亞的惡名。此外，這樣的特殊視角並非要為中國改革開放後到現今施行一胎政策的優生法案辯護，也沒有忽略追求更好的健康與生活的在地渴望。恰恰是方法論與歷史性的因素使得比較研究變得如此之重要：它使我們不致偏頗地標準化某個單一觀點，因為一般標準化的權威往往建立在一組以西方國家為主、尤其是英美特有的歷史經驗；它同時使我們能夠超越傳統以優生學的成敗得失做為價值判斷的歷史取徑。如同 Mark B. Adams 指出：

⁵⁰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Vintage, 1980), vol. I, p.137.

⁵¹ Rey Chow,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7.

⁵² Yuehsen J. Chung, *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Eugenics in Sino-Japanese Contexts, 1896-1945*.

⁵³ Regina M. Feldman 對保守派的修正主義以及自由派的哈伯瑪斯對此企圖的回應提供了相當有洞見的分析。保守派的修正路線引爆了三場圍繞在一九九〇年東西德統一以及國家認同形塑的重要辯論。見 Regina M. Feldman, "German by Virtue of Other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in Three Debates," *Cultural Studies* 17.2 (2003): 250-274.

當我們只研究單一國家的優生學時，無論怎樣透徹詳盡，其結論都顯得受到脈絡中的宗教、文化、社會、經濟、制度與科學等過多的變數決定，而這些變數又難以根據其相對重要性而予以排列。然而，若有足夠比較的案例研究並列在一起，我們或許就會注意到單一案例所無法呈現出的比較寬廣的圖像，而這幅圖像繼而又能帶領我們重新評價、更好地去理解特定國家的優生學。⁵⁴

在這樣的比較研究的基礎上，我的比較取徑與爲了增進對自身的認識而將其他案例抽離脈絡的研究不同，我是從日本與中國自身的角度與立場出發繼而開展其歷史性的比較視野，又同時重視兩國交疊的歷史脈絡，例如優生學在日本與中國的發展如何在第一次中日甲午戰爭（1894-1895）期間相互產生關連，又如何第二次中日戰爭（1937-1945）的歷史事件中交匯；前者時間點是中日在文化交流與技術轉移上的轉捩點，後者的交會點則被兩國的優生學者視爲一場人口戰爭。

在習慣用法之外，我將比較研究當成處理同時性（simultaneity）的方法論取徑。一般而言，比較研究意指分析平行並置而分歧的事件，而同時性則包含了複數的非同步的意識與時間性。我也借用 Mikhail Bakhtin 對兩股互爲緊張的離心力與向心力所提出的辯證構想，以及多重發聲小說（polyphonic novel）的概念——它提供一幅複數意識之間相互流動的圖像，其中沒有誰能夠被化約爲純粹的客體，我將比較研究視爲一種表達同時性概念的書寫模式，爲的是在表徵（representations）與現實中標定其相互主體性，從而讓我們對現代性與亞洲優生學迭有衝突的發展歷程有更佳的理解。與范發迪最近號召研究者走出民族科學傳統的「隧道式歷史」（tunnel history）相呼應，⁵⁵這個跨國比較的歷史不僅能夠拓展優生學領域在編年史學上的重要性，也能夠呈現出一個更爲寬廣且真實的二十世紀的歷史軌跡。

由於優生學在第二次戰後的聲名狼藉導致其世界各地的支持者亟思將其分支活動易名，優生學運動在一九八〇與一九九〇年代的中國捲土重來時，已失落其過去民國時期的歷史記憶，隨著中國大陸政府近十年來對優生法的推行，重新思考潘光旦的思想遺產並探索民國時期中國優生學運動的進程更顯重要。更重要的是，爲了將優生學的科學活動置放於更廣闊的歷史脈絡中而洞察史識，我在研究當中以第一次及第二次中日戰爭兩次交匯的歷史時刻爲框架，分析中國優生學與科學的發展，呈現優生學如何有助於我們理解科學術語的鑄造、民族性格、人口素質與成長、戰爭動員，以及史賓塞式與優生學就「最適者生存」在觀點上的分歧。史賓塞宣稱「戰爭」乃是進化的

⁵⁴ Mark B. Adams,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pp. 6-7.

⁵⁵ Fa-ti Fan (范發迪), "Redrawing the Map: Scienc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sis* 98 (2007): 524-538.

機制，然而優生學者則持反對立場，認為戰爭傾向將「優秀品種」推上前線，而最劣等的品種往往僅受到最少的傷害，而在戰鬥中存活下來。在中國追隨日本的腳步邁向現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曾是中國學習的榜樣和親密的合作夥伴。由於日本在日俄戰爭中擊敗對手，向全世界展示自身融合傳統與現代科技的成功，以日本的現代化為模範減輕了中國在向西方學習過程中的挫敗感與殖民反抗。在第一次交匯的時刻，中國與日本同樣在為文明進步而奮鬥，日本對追求科學的應用，特別是對優生學者來說，是啟發、中介與模仿的來源。諷刺的是，日本從被支配的地位爬升到支配者的地位後，成為中國的競爭者，當兩國的優生學者都把第二次交匯的中日戰爭，看作是成為最適者的進化過程。我的比較研究正是要召喚這個被遺忘的過去，而重述日本戰前經驗對我們而言則是再真實不過的提醒。

從優生學這個歷史的案例研究出發，我們可以知道科學的特權如何成為社會運動的道德預設與動機，而它的支持者又如何能夠基於此運動的階級、種族與族群偏見對這運動施加有力且具破壞性的影響。因而優生學對二十世紀的中國科學史來說是極有價值的主題：一方面，優生學作為一個外來的思想，透過語言學上的明確表達、奠定自身科學學科的地位、尋求社會贊助的基礎，並與國家協商而增進自身政治與法律的權力；另一方面，科學作為優生學廣泛的文化脈絡與物質條件，也遭遇到同樣的變化進程。優生學的支持者則就地取材，在其中策略性地動員其學科連結（disciplinary connection）、社會網脈與資源來深化優生學的科學基礎。社會大眾與知識份子就衛生、民族性、性道德、生育控制與人口政策等全國性議題進行公開辯論，辯論的過程逐漸凝聚對國家與社會連帶的體認；另外一方面我們也觀察到科學家和社會學家在其中充分利用其專業權威，並落實各式各樣社會文化工程（social-cultural engineering）以及建國（nation-building）方案——特別是人口政策。從科學與優生學錯綜複雜的歷史發展觀之，我們更能夠掌握優生學在替國家監管個人身體與民族健康的意識形態正當性辯護的重要性。

我之所以主張採取以上各個議題面向分別分析並採取不同的敘事風格與配置，正是為了要提供一幅「作為文化的科學」的深描，呼應中國科學史家席文（Nathan Sivin）所呼籲的——整合物質條件、知識生產的機制與技術性、政治操作、個人努力與競爭、社會歷史的偶然性而成的「文化整體」（cultural manifold）取徑。⁵⁶ 歷史學者通常僅選擇其中一個面向研究，而忽略不擅長的其他面向。目前已有其他研究者處理過

⁵⁶ Nathan Sivin, 〈文化整體：古代科學研究之新路〉（Cultural Manifold: A New Approach to Research on Ancient Science），《中國科技史雜誌》26.2（2005）：99-106。

一部分與優生學與科學相關的議題，然而他們或就科學技術、社會、政治、文化、智識等面向擇一切入，或多半關注一特定階段或地理空間，當我們尋求一個整體的前後一致的敘事時，這樣的單刀筆法的取徑在詮釋上便有一定風險。馮客（Frank Dikötter）在他著名的研究中，錯誤地把自清末以來的中國種族論述看作是優生學運動的起源便是明證。⁵⁷

六、結論：以史為鑑的學習勝於摸石子過河

中國的優生學運動走的道路與西方相當不同。「如何既成為適者又同時保有中國性」？這是同樣現代化難題——「如何既現代又不失去文化認同」的另一種提問！對中國的優生學者來說是一個極具挑戰性且須傾全力對付的難題。在東亞，人種改良的想法最早出現在日本，而不同人種間（黃種與白種）通婚的提議也時有所聞。然而，中國除了康有為外，幾乎不見優生學者倡議混種雜交。因此，中國的優生學者在能夠提出優生學的解決方案前，他們必須重新界定種族的位階，確認中國人的民族性和生物特徵，接著決定這些特徵在國體（national body）範疇內哪些是合適的，哪些是不合適的。緣此，中國遺傳學者在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對孟德爾定律有所提防，認為它只適用於動物和植物的繁殖上，在孟德爾學說中，由外在環境影響而調適獲得的體質改變是無法傳遞到下一代。這樣一來，如果孟德爾定律應用到人類身上，唯有禁止不適者繁殖一途能達致人種改良。在這個案例中，中國人，甚或所有黃種人——在西方社會達爾文主義者眼中次等的民族，在理論上唯有經由幾世紀與優秀的白種人混種交配才能混成為「適者」。但這樣一來，就會導致下面的問題：當我們說獨特的「中國人」時，究竟意味什麼？我們的研究結果發現，主張生物因應外在環境條件下所作的體質調適可以遺傳到下一代，反而在中國優生學運動中較易被接受，因為它給予中國人努力改進的希望。⁵⁸

我們從以上近代中國優生學的歷史經驗學習到了，生物力量透過科學的優勢權威作用到人類社會的階級、種族、國界和區分我者他者的劃界，其所帶著的固有偏見常

⁵⁷ Frank Dikötter,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2)。韓嵩（Marta Hanson）探討中醫寫作傳統中「強健的北方人與柔弱的南方人」論述裡對族群（ethnicity）的建構，而這樣的建構又是基於地方生態的非本質性變化（non-essential change），而非生物學上的決定論，這樣的分析比較令人信服。見 Marta Hanson, “Robust Northerners and Delicate Southerners: The Nineteenth-Century Invention of a Southern Medical Traditio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al Critique* 6.3 (1998): 515-550.

⁵⁸ 見我新發表的文章：Yuehtsen J. Chung, “Eugenic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1890s-1940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ugenics*, eds. by Alison Bashford and Philippa Lev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258-273.

常遮蔽了倡導者、甚或研究者自我的判斷和行動。我們對於這樣備受爭議的話題的迴避、抗拒、繳械投降、甚至唾棄，只有讓來者重新摸石子過河，更令人膽戰心驚的是重蹈覆轍。

總結本文觀察，社會達爾文主義和文明的論述是中國知識份子認知到國際間無情殘酷生存競爭的硬道理，中國人面對自己的身體上和智力上的殘缺不全不僅是一種認知上的隱喻，也是知識份子在海外的交涉、生活和求學的體驗，這是中國優生學輸入的思想趨力，而不是中國的種族論述，我們不能倒果為因。另外優生學受到左派右派份子的挪用，而潘光旦本人的遭遇就是一個很貼切的展現，他被國民黨視為左派，被共產黨視為右派，一九五七年潘光旦在大陸的反右運動中被劃為右派反動份子，一九六七年文化大革命的高潮期他被打傷折磨致死，其罪名無非是他早期批判過蘇聯的李森科罷了。

「民族保育政策綱領」的通過使得婦女的權益在法律上受到保障，雖然禁止溺嬰、墮胎、早婚、娶妾的傳統陋習和綁架販賣人口，以及強制婚前健康性病檢查，並不是衝著照顧婦女本身的利益而來的法規，而是關照到整個人口素質的增進的附屬品，使得人口的另一半成為當然的受益人，但是婦女利益被提到婦嬰保護的國家政策的層次上，不就是歷來中國與國際婦女運動的目標嗎？這個法案無形中也省下了不少婦女運動的先行者的氣力與犧牲。雖然「民族保育政策綱領」胎死腹中沒有付諸施行，但是以上這些婦女運動的核心價值陸續地在大陸、臺灣、香港持續發揚光大，而婦嬰保護法案終於在一九八〇年代到二〇〇二年在這些地方底定下來。

比較近代中日的優生運動研究，在共時性的歷史視野上展現了優生學運動發展的不同可能性和結果，成功地解釋歷史現象的複雜性與處理現代性的生物力量的為好為壞的兩面刃，使得我們超越優生學在一九四五年之前被汙名化的認知，中肯地面對中國大陸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優生學運動的持續發展，並積極地介入參與目前我們的生物醫學發展的議題例如幹細胞研究和克隆複製人、複製器官、基因治療、代理孕母、安樂死倫理等等的辯論，而以上的研究成果恰恰是提供了這些議題的公共辯論的題材。

【附錄】

民族保育政策綱領

檔案存於：南京第二歷史檔案館 全 278 號 內政專門委員會研究資料
人口局擬稿，時間：1944 年

人口政策綱領初稿

第一章 總則 本章說明中國人口政策之精神所在

第一條 根據立國精神順應世界潮流本乎國家需要基於科學原理訂定本綱領人口數量。

第二章 人口數量

人口為立國要素之一數量之多寡直接影響國家前途之否泰因專設本章

第二條 改進醫藥衛生防止災害疫癘延長人生壽命減低死亡率以期人口數量相對合理增加
說明：本條為人口政策主幹所在，關於人口數量問題時人論列獎勵節制之見迄未
一致，亦或有主張適中之論，但我國尚乏精確統計基礎，若干主張依據究嫌
薄弱，本條所以主張減低死亡率以求人口相對合理之增加而不採獎勵或節制
辦法者其理由如次

（一）我國目前不能實施節制政策者：

1. 人民為立國要素之一，人力亦即國力，值此世界風雲強權政治世人仍多奉為圭臬，環球國家尚少採取節制政策者，況 國父在民族主義中亦早有人口壓迫之警誥，故節制政策自不宜採行。
2. 目前內地人口就統計數字及實際上之觀察固不無過剩之感，惟一但情況改變如地理分布調節均勻部分農業人口轉化為工業人口則上述事實即不復存在矣。
3. 抗戰之後繼以內亂人口死亡甚鉅且死者大部均屬少壯，此不僅影響一時人口之增減且將及於下代人口之繁衍故現時不宜再為人為之減少。
4. 據專家研究中國人口屬於穩定式，近三十年來無人口增加之威脅（詳見附錄）故不必再為人為之減少。
5. 另據統計近一百八十年來中國人口增加率有逐漸減低之勢列表如次：

時期	年數	每年每千人之平均增加速率
乾隆六年至乾隆五十八年	五二	一五·一四
乾隆五十八年至道光二十九年	五六	四·九五
道光二十九年至民國十二年	七四	·八一

（詳見中國近百八十餘年來人口增加之徐速及民勢之興遷登載《東方雜誌》第二十卷第十八號）觀此故尤無須再為人為之減少。

6. 文化進步生育率有遞降趨勢，雖死亡率減低而自然增加率亦不致過分提高故亦無節制必要至生育率遞減原因有二：

A. 經濟之原因：因文化進步婦女工作自由權漸次獲得經濟獨立，不必再以出嫁為唯一生活目的因此出嫁人數比例減少，生育率遂亦蒙受影響，又婦女於獲得經濟權後，一部分婦女拋棄家庭職務從事政治活動及社會服務自不願再受家庭子女束縛，此亦促進生育率之降低。

B. 教育原因：文化進步婦女亦漸次得受高深教育不獨結婚年齡為之提高並可自行選擇適宜之生育數量，因之生育率為之減低。

(二) 我國目前不宜採取獎勵政策者：

1. 中國目前人口問題之癥結在窮與愚而不在量，國父固重視人口壓迫，但嚴重性尚在百年之後而民生民智問題則認為立待改進：「我們中國人現在的痛苦每日生活至少總有三萬萬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國是世界最窮弱的國家、、、現在的中國不但是最貧弱的國家，並且是最愚蠢的國家」（民十二年十二月講學要立志作大事不可立志作大官），基此故目前階段應置重點於民生改善與人口品質之改良。

2. 中國人口密度原不為過高，每方公里四二人，但因地理上分布之不均，則東南半壁人口密度每方公里近 100 人，超出印度西歐水準，江蘇竟超出每方公里三百餘人，西北半壁則每方公里不過一人，類乎澳洲西北利亞之密度（見《戶政導報》創刊號一三一頁〈中國人口密度之地理分析〉「註」東南與西北之分野，以大興安嶺陰山及西藏高原邊際之三千公尺等高線為界）故在人口調節未完成前則因獎勵而增加之人口將無法消納。

3. 本條主張減低死亡率及第三條之規定實施結果，雖無獎勵之名而人口已〔已〕相對自然增加矣。

第三條 嚴禁墮胎溺嬰納妾蓄婢，取締妓院輔導妓女從良就業，以防止人口之殘害。

第三章 人口品質

國家強弱不惟視人口數量之多寡，亦且視其品質之優劣所謂「愚民百萬謂之無民」，近世各國對於人口問題均取質量並重政策，尤重質的改進，果精良一人當十百人用，則國家強盛亦非必待于增育也，因專設本章。

第四條 普及國民教育撲滅文盲以增民智

說明：據統計三十四年學年度失學兒童占學齡兒童數百分之六十・四七，文盲占百分之七二・七二（卅六年六月十七日《大公報》張天麟作國民現狀），由此足以反映我國民智之低落，故普及教育以改良已生人口品質，寔為要圖，因擬本條。

第五條 左列無業人口一律收養救濟施以技能訓練俾成為健全國民。

流浪兒童之養育

乞丐之收養及技能訓練

貧困之救濟及技能訓練

災民之救濟及技能訓練

無業游民之強迫技能訓練

說明：上述各項無業人口數量雖無精確統計，但其大量普遍存在，無可否認，此種人口非惟不能裨益人群及足增社會負擔，而為社會進步之障礙，但若一經教化即可立轉為有用之人，故國家應不惜一時之費用，普設教化機關，則後利實屬無窮，因擬本條。

第六條 左列事項應積極改進以增強國民健康

提高生活水準改良國民營養

普遍推廣國民健身運動

特別流行疾病，砂眼，牙病，肺病，性病等設法矯治根絕

第七條 左列劣等人口應制度法律限制其生殖以提高未生人口之品質

有惡性遺傳疾病者

痴瘋低能者

身體嚴重畸形者

身體經醫師診斷特別羸弱者

說明：此等人口不僅影響其本身健康，且因遺傳關係其影響更及其子孫，故宜制定法律，凡遇所列情形經醫師鑑定者，應禁止其結婚，已結婚者，應消滅其生育機能，並准許其夫妻之一方請求離婚，以免劣種人口之流傳。

第四章 人口調節

第八條 實施國內計劃移民，以充實邊疆，減輕內地人口過剩壓力

說明：我國人口地理上之分佈至為不均，東南半壁面積佔全面積百分之四九，西北半壁面積佔百分之五一，而人口分佈則東南佔全人口百分之九八·七，西北僅佔百分之一·三（《戶政導報》創刊號一三一頁中國人口密度上之地理分析），故內地人口雖已感過剩而邊疆仍空虛，若盈虛調和，不惟可銷人口數量問題于無形，而舉凡國防之充實政治之安定經濟之發展，諸立國要計亦可迎刃而解。

茲據現有統計邊疆移民容量——

內政部二十二年荒地調查全國共計八四七·一六〇·〇〇〇畝，若以每人二十畝計，約可移民四千萬人。

另據統計全國約可移墾之數

東北九省約可容納三千至六千萬人（《戶政導報》二期頁六九）

西北察綏陝甘寧青新約三千萬人

西南：滇省荒地五·三〇〇·〇〇〇畝（雲南難民移墾方案）約可移民二六五·〇〇〇人（以每人二十畝計），川省荒地九·五二七·〇〇〇畝，約可移民四七六·三五〇人（川建設廳調查），黔省荒地二·〇二四·〇〇〇畝（《西南實業通訊》二卷六期）約可移民一〇一·二〇〇人，康省荒地二·六四九方里（川寧屬農報調查報告）約合九九三·三七五畝，可移民五〇·〇〇〇人合計百萬人，觀上述統計約可移民六千萬人至九千萬人，惟因交通之不便，調查方法未能完備遺漏之數，恐不能免，故實際可能移殖之數當不止此。

第九條 獎勵國內宗族雜居，通婚游歷以期促成血統言語風俗習慣上之融合

說明：我國宗族分佈漢族聚居內地，其餘宗族則散邊疆，雖歷代相依，但往還殊稀，近年國步多艱，對宗族問題之合理解決尙未能兼籌並顧，致危象環生，如蒙古宣告獨立，新疆機惶不安，西南夷胞則叛服靡常，若不及早設法而禍起蕭牆將噬濟無及，應體 國父民族主義之精髓，消除畛域之見，種族之分，進而融成整一之中華民族，因擬本條。

第十條 獎勵國外移民爭取國際移民自由，保護僑民利益，改進僑民品質，對移入外僑施以合理管制，期以和平力量促進中外文化交流，以敦睦交

說明：華僑數量據一九三五年僑務委員會統計爲七。八〇〇。〇〇〇人，一九三八～一九三九英文中國年鑒所載爲七。七〇〇。〇〇〇人，唯因統計不確，土生華僑又多被視爲僑居國之國民，故實數當不止此，惟華僑大部均以傭工爲生，或經營小工商業，知識水準低落，復以政府保護無力，致外受當地政府壓迫排斥，內則幫會紛歧，門戶之見極深，現勢所驅〔趨〕，僑務前途殊堪憂慮，其對祖國貢獻亦僅僑匯而已。

故政府應確立僑民政策，對既有僑民加強保僑業務，普及僑胞教育，加深對祖國之了解，註輸國家意識，對國內人民指導鼓勵外移。對於外僑移入之後應施以合理管制，以擇長補短，促進世界文化進步，以和平相處代替武力征拓，以我傳統之王道精神，實現大同理想，代替列強霸道之暴力迷夢，因擬本條。

第十一條 發展工業吸收農村過剩人口，以增加國民總生產力。

說明：一般農業先進國家，美國每農民平均每人可得可耕地三一。七英畝，丹麥平均每人可得一六。二英畝，法國每人可得六。一英畝，意大利每人可得三。一英畝（以上陳達著《人口問題》三八七頁）中國則平均每農民可得可耕地二英畝（據許士驥著《人口論綱要》二五〇頁估算），由上述比例可知我國農村人口確感過剩又我國農村人口竟佔全人口百分之八十，比例亦顯過大（陳達著《人口問題》三八七頁），至于我國工業尙處幼稚階段，輕重工業\小至日常用品，大至國防器材大部份均依賴舶來，一旦世界有變，問題殊爲嚴重，若發展工業，既足以增國富，亦可藉此吸收農村過剩人口，因擬本條。

第十二條 制訂保障婦女工作法律，以促進婦女在社會政治經濟地位上之平等

說明：我國男女地位固早已承認平等，但由于積俗所至，多數婦女尙平等競爭能力，平等之說僅負虛名，故宜制定法律，特別扶植如工作適宜婦女者，應獎勵由婦女擔任其他工作機會，亦應無分軒輊如此，則國家即立增大量工作人員，因擬本條。

第五章 家庭制度

家庭爲人類結合最小單位，社會之基層組織家庭之熙和，非特人人可獲人生樂趣，而社會亦致祥和之象，是以先哲視齊家爲治平之本，而 國父 領袖亦以此諄諄勉誡國人，因專設本章。

第十三條 勵行一夫一妻，提倡小家庭制度，以期人性合理，發展保障家庭幸福生活。

第十四條 須訂結婚儀式，應莊嚴節費，離婚程序力求慎重，以健全家庭組織。

說明：我國舊式婚姻預備六禮，繁瑣無當，固不足法，但今日婚禮往往漫不注意，形同苟合，亦非文明國家所宜取，按男女結合家庭肇立，由此退而身家修齊，擴而推及治平，若創端不正，何以臧後，故應隆重婚禮昭慎于始，但須節費養成樸實之風氣，至若夫婦意見不恰，白首難期，離婚之舉原無可非議，但近世流演，朝結夕離，易如飲水，亦屬不合，故離婚程序亦應力求慎重，庶幾家庭組織因此健全，家庭幸福由此獲致。

第十五條 提倡適時結婚以避免早婚之弊害

說明：我國民法第九百八十條「男未滿十八歲，女未滿十六歲者不得結婚」，在防止早婚之害，其意至當，惟對遲婚則不加規定，按照一般情形早婚者多屬一般普通人民，而知識優秀份子則獨多晚婚，影響人口品質之提高殊鉅，應提倡適時結婚以除此弊。

第十六條 結婚之前實施體格檢查，普及婦嬰保健訓練，以期增進家庭幸福。

說明：參見第七條說明

第十七條 廣設託兒所以增婦女工作機會

說明：職業婦女最大困苦，厥為子女照拂其採取途徑不外放棄工作機會或節制生育，但此均非國家所願，因擬本條。

第六章 人口行政與人口問題研究

我國古時本重人口行政，自清乾隆三十七年停止戶口定期編查以後，於是人口查記之政不修，歷多年來未能重振，時至今日竟視若新政，茲值開端慎始最要，人口原理之探討足以指示人口問題之合理解決，因專設本章。

第十八條 切實普遍實施人口查記工作，以為各項施政依據

說明：我國人口查記工作向未澈底，致人口數量尚無精確統計，根據各家估計數字出入懸殊甚大，影響所及，百政失其依據，舉其大者如兵役未上軌道，選政弊端百出，經濟統制措施，諸多無法貫徹，不惟影響國計民生，抑亦妨礙憲政施行，因擬本條。

第十九條 專科以上學校應酌設人口科系或課程，以便造就專門人才

說明：舉凡事業之興建須待專才，而新式人口行政我國尚屬創舉，故人才之造就實為正途，因擬本條。

第二十條 著述與翻譯對人口問題有特殊貢獻者，應給予獎勵。

引用書目

丁文江

- 2008 〈哲嗣學與譜牒〉，《丁文江文集》，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卷一，頁 3-23。

李中清、郭松義編

- 1994 《清代皇族人口行為和社會環境》，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李潤楨

- 2002 《近代日本における帝國主義イデオロギーとしての優生思想》，東京：東京學芸大學碩士論文。

姜義華等編

- 1990 《康有為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莊建平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譯室編

- 1992 《國耻事典》，成都：成都出版社。

梁啟超

- 1932 《飲冰室合集·文集》，上海：中華書局。
1959 《新民說》，北京：中華書局。
1983 《飲冰室文集》，臺北：中華書局，第一冊之三。

梁啟超，吳松等點校

- 2001 《飲冰室文集點校》，昆明：雲南教育出版社，第 1 冊。

張海鵬等編

- 2001 《國耻百談》，北京：中華書局。

黃克武

- 2000 《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和批判》，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郭正昭

- 1971 〈中國科學社與中國近代科學化運動（1914-1935）：民國學會個案探討之一〉，收入《中國現代史專題研究報告》，臺北：中華民國史料研究中心。
1972 〈社會達爾文主義與晚清學會運動〉，《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3：557-625。

楊蔭杭

- 1993 《老圃遺文集》，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

潘光旦

- 1993 《潘光旦文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5 《潘光旦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

- 翦伯贊等編
2000 《戊戌變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嚴仁英主編
1990 《楊崇瑞博士——誕辰百年紀念》，北京：北京醫科大學、中國協和醫科大學聯合出版社。
- 席文（Sivin, Nathan）
2005 〈文化整體：古代科學研究之新路〉（Cultural Manifold: A New Approach to Research on Ancient Science），《中國科技史雜誌》26.2：99-106。
- 坂元ひろ子
2000 〈足のデイスコース—纏足、天足、国恥〉，《思想》907：145-161。
- Adams, Mark B.
1990 “Eugenics in Russia, 1900-1940,” in Mark B. Adams ed.,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ow, Rey
2002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hung, Yuehtsen J.
2002 *Struggle for National Survival: Eugenics in Sino-Japanese Contexts, 1896-1945*.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Eugenics in China and Hong Kong: Nationalism and Colonialism, 1890s-1940s,”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Eugenics*, eds. by Alison Bashford and Philippa Levi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Better Sex and Better Conception? Eugenics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in Contemporary China,”《科技、醫療與社會》(2011.12).
“The Postwar Return of Eugenics and the Dialectics of Scientific Practice in China,” *The Middle Ground Journal: an Online Journal for World Historians*. (forthcoming).
- Cohen, Paul A.
2003 *China Unbound: Evolving Perspectives on the Chinese Past*. New York: Routledge Curzon.
- Cowan, Ruth S. Schwartz
1985 *Sir Francis Galton and the Study of Heredity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 Darwin, Charles
1981 *The Descent of Man, And Selection in Relation to Sex*.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Dikötter, Frank
1992 *The Discourse of Race in Modern China*.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Duara, Prasenjit
2001 "The Discourse of Civilization and Pan-Asianism," *Journal of World History* 12.1: 99-130.
- Fan, Fa-ti
2007 "Redrawing the Map: Scienc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 *Isis* 98: 524-538.
- Fancher, Raymond E.
2009 "Scientific Cousin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arles Darwin and Francis Galton," *American Psychology* 64.2: 84-92.
- Feldman, Regina M.
2003 "German by Virtue of Others: the Search for Identity in Three Debates," *Cultural Studies* 17.2: 250-274.
- Foucault, Michel
1980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New York: Vintage.
- Galton, Sir Francis
1909 *Memories of My Life*. New York: Dutton. (first edition in 1908)
- Graham, Loren R.
1977 "Science and Values: the Eugenics Movement in Germany and Russia in the 1920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82.5: 1133-1164.
- Hacking, Ian
1990 *The Taming of Cha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anson, Marta
1998 "Robust Northerners and Delicate Southerners: The Nineteenth-Century Invention of a Southern Medical Tradition," *Positions: East Asia Cultural Critique* 6.3: 515-550.
- Hawkins, Mike
1997 *Social Darwinism in European and American Thought, 1860-1945: Nature as Model and Nature as Threa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dges, Sarah
2008 *Contraception, Colonialism and Commerce: Birth Control in South India, 1920-1940*. Farnham, UK: Ashgate.
- Hofstadter, Richard
1944 *Social Darwinism in American Thought*. New York: George Braziller.

- Kevles, Daniel J.
1985 *In the Name of Eugenics: Genetics and the Uses of Human Heredit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Inc..
- Ko, Dorothy
1997 "The Body as Attire: The Shifting Meanings of Footbinding in seventeenth-century China," *Journal of Women's History* 8.4: 8-27.
2005 *Cinderella's Sisters: A Revisionist History of Footbindin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MacKenzie, Donald A.
1978 "Statistical Theory and Social Interests: A Case-Stud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8.1: 35-83.
1981 *Statistics in Britain 1865-1930: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Nagai, Michio
1954 "Herbert Spencer in Early Meiji Japan,"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1: 55-64.
- Paul, Diane B.
1998 *The Politics of Heredity—Essays on Eugenics, Biomedicine, and the Nature-Nurture Debate*. Albany: SUNY Press.
- Schneider, William H.
1990 "The Eugenics Movement in France," in Mark B. Adams ed.,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wartz, Benjamin
1952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a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Soloway, Richard A.
1990 *Demography and Degeneration: Eugenics and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in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 Thomas, Julia A.
2001 *Reconfiguring Modernity: Concepts of Nature in Japanese Political Ideology*. Berkeley: UC Press.
- Tikhonov, Vladimir
2002 "The Experience of Importing and Translating a Semantic System: 'Civilization,' 'West' and 'Russia' in the English and Korean Editions of the Independent," *Han'guk Minjok Undongsa Yŏn'gu* 32: 57-103.

- Tsu, Jing
2005 *Failure,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Making of Modern Chinese Identity, 1895-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ang, Hsiuyun
2003 *Stranger Bodies: Women, Gender, and Missionary Medicine in China, 1870s-1930s*.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Madison.
- Weiss, Sheila F.
1990 "The Race Hygiene Movement in Germany, 1904-1945." in Mark B. Adams ed., *The Wellborn Science: Eugenics in Germany, France, Brazil, and Russ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ong, Young-tsu
2010 *Beyond Confucian China: The Rival Discourses of Kang Youwei and Zhang Binglin*. New York: Routledge.
- Ye, Weili
2001 *Seeking Modernity in China's Name: Chinese Stude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00-192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Young, Robert
1990 *White Mythology*. London: Routledge.